

吴晓明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

“1978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进入复旦哲学系,在这之前,我在农场劳动,还当过生产队长,有着近40多年的学术经验和社会经验,我想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学术的整体发展情况。”

3月12日下午,在相辉堂北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文科大类首场专题大课,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没有抽象的真理 真理是具体的

由现代性,吴晓明引出世界历史的普遍特质。他说,世界历史不仅是广阔舞台,还是一个权力架构——有着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是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态势,“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不可避免的会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历史命运。

如何来理解这种普遍性?他举了个例子:1844年,在思考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时,马克思的回答是“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社会革命的普遍性,必须根据德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 吴晓明教授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面向在座的听众,吴晓明提醒:“各位文科同学们,你们必须要给自己提出一个较高的理论要求,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性,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要把这种普遍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他认为,在承认现代化的普遍性、不可避免性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现代化。

摆脱“学徒状态” 获得“自我主张”

“学徒状态”由大规模的对

外学习开启,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吴晓明看来,随着大规模对外学习的展开,“自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从总体上进入了对外部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并不突兀,它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不可能得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转折是在学术上、思想理论上、文化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几乎可以说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

以及个人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为一名老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学生能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并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吴晓明说。

“学”和“思”是不同的

虽然“学徒状态”是一条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它也存在着依赖的、模仿的、因循的基本缺陷,是思维方式上的“外在反思”,即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

吴晓明直言,“‘学’和‘思’是不同的,‘学’是知识、学问,‘思’是思考、思想。”“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什么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它的意思并不是有点中国元素、有点中国色彩、有点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谈得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认识自己中 接受文化结合的锤炼

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而是意味着,要使我们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外学习与自我主张的统一,需要文化结合的锻炼。”吴晓明说。

对于文科类同学们常会碰

到一些关于“古今中西”主题的问题争论,吴晓明认为,这种争论,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种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的表现尤为明显。“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体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吴晓明说。

吴晓明认为,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如何理解传统?他说:“传统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往;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今天的过去,依然活在今天的过程。”他期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能作为一个探索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寻找有趣的研究入口。

现场,同学们通过学生工作部的“智慧书院”小程序纷纷提问,吴晓明一一耐心解答,一个半小时的专题大课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

张军演绎把经济研究做在中国大地上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与时代同行,把经济研究做在中国大地上》。”3月12日下午,在复旦浸润了44年的老复旦人、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在相辉堂北堂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这也是社科大类第一场专题大课。

“我将会跟大家展示我的研究、观察以及我对中国经济的理解。这,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背景下。”他站在讲台上,娓娓道来,把个人的学术历程和复旦人的故事巧妙置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将“道路与道理、专业与事业、大我与小我”演绎得精彩纷呈。

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与大师同行是幸运的。我受益于太多的大师名家和杰出经济学家的教诲,即便有些只是见到名字而已。”张军曾说,“最要感恩的是机遇,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很幸运自己在经历和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成长为经济学家。”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一个春潮激荡的时代,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时代变迁有不同寻常的感受。

出生在60年代的张军调侃,物质财富没赶上积累的好机遇,但是精神食粮却收获满满。借着改革开放机遇,张军考入大学学习经

济学,有了直接观察研究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极其难得的机会。30岁不到,张军出版《现代产权经济学》等3部学术著作,从此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从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张军反而渐渐察觉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这背后,一种无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与以往研究经济转轨范式不同的“中国模式”,支撑着中国经济转型保持了快速的增长。他放弃了从悬浮的西方经济理论来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固有念头,转向聚焦国内“双轨制”研究。1997年张军出版《“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等一系列著作,力求让研究跳出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用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讲好中国故事。

这就是张军常说的,研究要“立足中国大地”。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与时代同频共振

幻灯片上闪过一张张老照片,复旦经济学人的身影始终活跃在学术研究和改革开放的前沿。

1983年,复旦经济系原系主任张薰华教授一篇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批租必然性,首次提出解决土地使用问题的方



▲ 张军教授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案,契合上海改革开放的需求。张薰华教授受邀撰写《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一文。上海市专门成立土地批租办公室,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经济系一批教师参加土地批租问题研究小组,为浦东开发开放奠定理论基础。

2023年12月,教育部设立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重大专项,落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旨在研究和建立贴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准确阐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中国经验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何种启示?中国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更为普适的分析框架?如何吸引年轻一代人才研究中国经济领域,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张军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人需要攻克的难题。

发挥复旦优势做研究

“老师,您30岁不到就出版经济学著作,确定学术发展的方向。老师是如何在不到30岁时就找到了自己的毕生爱好,并能在之后持之以恒地追求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3级社科试验班的贾一帆问。

“其实最初我想学的是法律。”张军的回答,让同学们笑了起来。张军回忆起在复旦求学的岁月,那时的复旦校园,去教室有听不完的精彩演讲报告。“我记得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和农发所的周其仁来校园作报告,让我很震撼。因为他们不讲课本知识,只讲在基层的调研所见所闻、统计数据如数家珍。”

学生时代的张军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基层详实全面的数据报告,结合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迁,对时代的理解一下子变得真实又具体。“是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因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给出了普遍适用的理论,这让我一下子爱上了经济学。”

张军鼓励学子,利用复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把握综合高校多元学科环境带来的发现重要问题的机会,丰富经济学研究方法,拓展经济学学术边界,获取更广泛的学术启示,为中国学术发展作贡献。

相辉堂北楼楼上楼下坐满了同学们,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张军用两节课的时间,深入浅出讲述中国经济与形势,带来别样的思政大课,鼓励青年学子在时代的洪流中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传承、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